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六六期 ——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11e)

【本刊专稿】我没有参加政变会议——原南空副司令周建平访谈录	舒 云
【回首文革】迟泽厚访谈（节录）	叶曙明
【历史一页】东湖风云录（之一）	徐海亮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本刊专稿】

我没有参加政变会议
——原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访谈录

• 舒 云 •

◇ 关于我的免于起诉书是错的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我一直很坦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找我谈话，副司令员王六生、萧永银在场。许世友说，根据我们知道，人家对你不信任，你不能同某某某比，他们做的坏事多，你好好检讨，否则我们不好同群众讲话。我心里很清楚，我是忠于党的，没干对不起党和革命的事情。至于检讨，我想得通，干工作，怎么可能没有缺点错误，做错了，检讨就是了。

没想到事情远不那么简单。

1971年9月25日，我被关进南京空军的学习班，以后被押到北京丰台，继而关到亚洲疗养院。在去亚疗的路上，公安部的人对我说，你就那么点问题，没什么事。亚疗都准备放我出去了，我和被关押的人都发给了领章帽徽。但没有想到，问题越来越大，1978年5月29日，我竟被关进秦城监狱。保卫部门写了个东西，硬要我签字，承认参加了“黑会”。19

82年1月15日，在根本没有出示证据的情况下，军事检察院做出了“免于起诉”的判决。

◇ 我究竟犯了什么罪？

《（82）军检免字第5号免于起诉决定书》确认我犯有以下罪行：1971年3月31日晚至4月1日晨，被告人周建平在上海岳阳路原少年科技站，参加了由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林立果，根据《五七一工程纪要》关于建立武装政变“指挥班子”的计划召开的秘密会议。……周建平中途到会。会上林立果指定周建平为南京的“头”。会后周建平根据江腾蛟的旨意，指派了驻上海王维国处的联络人。……被告人周建平，积极追随林彪，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的规定，已构成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鉴于被告人周建平所犯罪行情节较轻，根据《刑法》第24条的规定，决定免于起诉，予以释放。如果不服本决定，可以在七日内向本院申诉。

这个免于起诉书完全是错的！

直到今日，我仍然不服，曾多次到北京申诉，我坚信事情一定会搞清楚。

◇ 如果是会议，我是结束后才到的

刚一拿到《免于起诉决定书》，我特别吃惊，我认为完全不符合事实。但当时我并不懂免于起诉是怎么回事，以为没什么事了，没想到免于起诉也是一种罪。有关部门没有拿出任何证明我犯罪的证据，在宣布前与我谈话，只笼统地讲我有严重错误，与他们有区别，不一样。而《免于起诉决定书》认定我的罪行是参加了林立果在上海岳阳路召开的“秘密会议”，事实上我没有参加。

◇ 那你为什么不在规定的上诉时间上诉呢？

拿到《免于起诉决定书》后，我暂时没有上诉，违心签了字。因为我还在监狱里，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我手里也没有任何证据，只能回去慢慢搜集材料。而且我已经被关了十多年了，一直不能与家人通信，家里到底怎么样了，也不清楚。我不想再因为上诉继续被关在监狱里，来日方长，先出狱再说。

以后我从1980年11月26日的《解放日报》才知道，江腾蛟11月25日下午在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供认，会议从晚上10点多钟到第二天凌晨3点多。而我是4月1日凌晨3点多钟，也就是“秘密会议”结束之后，才到达会议地点的。那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是空四军情报处长蒋国璋开车来接的我，他敲门的时间是夜里两点多，虽然是夜深人静，但蒋国璋刚学开车，技术不熟练，再则上海的马路拐来拐去，从西北方向斜穿整个上海到达东南方向的岳阳路，费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这样，我到达时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

◇ 那么，是不是为了证明你中途到会，起诉书故意模糊了时间？

是的，起诉书说会议时间是1971年3月31日晚至4月1日晨结束。我曾在申诉书中提出，在涉及罪与非罪的关键事实——“秘密会议”的起止时间上，《免于起诉决定书》作为一项严肃的法律文书，为什么不用已经被法庭确认的“10点多”和“3点多”这两个准确反映客观事实的时间概念，却用“晚”和“晨”这两个伸缩性很大的模糊概念呢？很显然，如果确认会议是“3点多”结束，那么只能证明我不在现场，从而排除我参加会议的任何可能性。可是用了“晨”这个时间概念，就可以把会议实际结束时间随意延伸，把明明是在会议结束后到

达会议地点的我说成“中途到会”。

◇ 您的这个申诉很有力量，他们最后是不是认错了呢？

没有。从1984年起，我就不断给军事检察院写信，要求出示证据。对方始终没有给我看过证据。1984年5月15日，有了回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84）军检字复字第一号《复查决定书》来了，经本院复查认为：原认定你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你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故维持原决定。

我一字一字研究过这个《复查决定书》，虽然维持原判，但与《免于起诉决定书》有了几点小小的不同，不再说“证据确凿”，而是改成“证据充分”了。“被告亦供认不讳”也被划掉，不再提及。但“免于起诉”的决定仍维持不变。

那么，由检察院代替法院定罪，是不是有法律缺陷呢？现在《刑法》上免于起诉这一条罪已被取消了。

是的，但已经定了的免于起诉罪却没有取消！

◇ 我什么时候到的上海

1986年，我专门到北京上访，当面陈述。某负责同志说，你所以迟到，是因为到南京接你的飞机受天气影响延误了。

这使我大为惊讶，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我是1969年从上海空四军调到南京军区空军的。之所以没有搬家，是因为正值“文革”，南京地区比较复杂，派性严重，不少机关干部的家属在地方挨了野蛮批斗。我家属老戴身体不好，就暂时留在上海。后来经过空军批准，老戴调到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任副主任。我从北京参加党委扩大会议回来，这才回上海搬家。

1971年3月26日，我就到了上海，偏偏这时老戴住了院。刚开始以为是慢性阑尾炎，没想到打开后是卵巢囊肿。手术持续了八个小时，腹腔里抽出好多血，肠子也切掉了一尺多，术后好久不能下地走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一时搬不了家，就在上海滞留了几天。

那时我根本就不知道林立果在上海。我到上海的当天晚上，于新野来看我，才告诉我林立果在上海。于新野说，人家对你有很多意见，林副部长正在做工作，准备找你谈一次。于是，3月28日，王维国接我到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去见林立果，路上王维国讲了与空五军因为看病问题引发的很多矛盾，我哪里想到别的什么。这中间还有一个情况，南京军区空军刘懋公等人向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汇报了南空两派的问题，吴法宪很生气，下决心要狠整一下机关，组织了学习班，专门解决南空问题。当时我在机关也是处在夹缝中，说话没人听，有人搞了好多名堂整我，甚至公开说要与我斗争到底。我一气之下，干脆到上海治病，所以北京办学习班开始我没去。刘懋公希望我去，几次打电话。吴法宪不知道情况，以为我在“左派”一边，还专门给我打了招呼，你回去要保证南京的党代会开好，要说公道话，不要靠在哪一边。我知道，要开好党代会，王维国和陈励耘是两个关键人物，我不能不做他们的工作。因为有这个背景，我当时理解林立果说南空以我为主的意思是稳住机关，不能再“无政府”下去了，根本没有政变的意思。

◇ 我们不知道“三国四方”

蒋国璋半夜2点多开车来接我时只是说林立果让你去谈话，没说开会。参加这次谈话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也都不承认是开会，更不承认是政变的会。

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三国四方”会议的名称。

“三国四方”只是事后有人问林立果，他顺口说出来的。

我到了以后，蒋国璋说在楼上，我就上了楼，看见林立果和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四人坐在那里。我在上海空四军任军长时，就和他们就保持一定距离。当时许世友曾对周建平说，人家想靠还靠不上，拉你还不去？确实，要不是为了搞好团结工作，我不会去做他们的工作。

◇ 那天晚上，你到了以后，他们说了些什么？

那时他们把我看成是威胁力量，不可能对我说什么。

林立果说，有人向中央告状，要把江腾蛟等人打成“五一六分子”，如果他们真被打倒，南空机关很可能出现杨余傅事件后那种反复局面，甚至更困难。为了稳定机关，防止反复，南空机关“左派”以你为主。3月28日晚上，林立果也说过这话。我一直认为是稳定机关，解决团结问题。林立果简单说了几句后，对我说，你把南空的情况跟他们谈一谈。说完，他就下楼去了，没听我们谈话。

我是南空党委的副书记，当时南空没有政委，在那个特定的情况下，司令员刘懋公说话又不起作用。空军把开好南空党代会的责任交给我，其实吴法宪也不知道空四军、空五军对我意见也很大，这就给了我很大的压力。当时南京军区先开了党代会，许世友主持，就没有开下去。许世友没办法，打电话给总参谋长黄永胜，黄永胜出面，会议才没有中途夭折。

那天半夜找到岳阳路去，就是为了南空党代会选举的问题。“文革”初，南京军区空军就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派性严重，如果司令员刘懋公没选上常委，那怎么行？一定要选上。王维国和陈励耘都是中央候补委员，我感觉他们三个人意见不一致的话，南空党代会就开不好，甚至开不下去。要选票，就要解决王维国和陈励耘的矛盾，让我来就是为了让让我做做工作。那天晚上我谈了南京军区空军贯彻空军学习班决议的情况和南京市清查“五一六”分子的一些情况。后来我又说了南空将召开党代会，征求江、王、陈的意见。陈励耘说会一定要开好，不能夭折。他讲五条，一、要发扬民主，让大家把话说完；二、前一届党委的报告要通过；三、高举团结大旗，四前一届常委要选上……江腾蛟和王维国表示同意。我很高兴，这回开党代会不会有麻烦了。

谈完林立果上来了，问你们在谈什么。江腾蛟说，我们在谈南空党代会召开的问题，已经谈完了，请副部长指示。林立果拿了个本子，说了以谁谁谁为主的话。这时就到了4点多，说下去吃饭。这中间没有一句谈到“五七一”，甚至也没有一句说到政变。

◇ 那怎么变成“秘密会议”了呢

虽然那天在场的人都说是为了解决团结问题，可专案组问，解决团结以后干什么呢？还不是为了政变，死活往政变上扯。所以审讯人员硬要我承认开了“秘密会议”。在出庭给江腾蛟作证时，审讯人员不让我说开会的内容，非要我承认参加了“秘密会议”。我耳朵不好，没听清。

审讯人员又连说两遍，我只好含糊地嗯了一声。

那天谈完后，我要回南京，江腾蛟说南京电话不太好打，你是不是派个人到上海来，住到王维国那里，通过王维国联系。我回到南京布置了以后，再也没过问，根本不知道派没派人到上海，更不知道派了谁。

而《免于起诉决定书》硬要把半年前的所谓“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草稿和这个“秘密会议”人为地联系起来，说是根据纪要草稿关于建立武装政变的班子。这完全是颠倒黑白！且不说究竟有没有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反正活着的人没有一个见过这个东西，我从来没听说过！就是有这么一个写在笔记本上的草稿，在九一三事件半年前开会找几个官不大位不高的人研究，情理上也说不过去。

◇ 我怎么可能参与政变

在关押期间，我曾问专案组，明明他们的指挥班子没有我，为什么你们非要说有我？专案组说，可能是协调把你协调进去了。我气愤地说，我没这个基础，我对党忠心耿耿，明明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为什么非要说成是政变？我怎么可能参与政变？为了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我和我的战友们流血牺牲，我为什么要推翻它？我参加革命不是没饭吃，也不是因为土改分了土地，就是为了抗日，就是为了革命。1935年我在学校接触了进步思想，就与同学进行了革命活动，办小报宣传抗日。

（史料一）中共江苏省委下属的外县委员会委员宿士平在一篇回忆录中说，连日来，整个苏州城的抗日救亡怒涛一浪高过一浪……黄埭乡师学生周建平等一行十七八名青年男女学生，一路高歌，正义之声吸引了成批群众参加游行队伍。到青阳里时，人群已达五六百人。口号声、歌曲声把他们的喉咙嘶哑了，臂膀摇酸了，但仍个个精神抖擞。龟缩在日租界的日本人都吓得不敢露面。示威活动持续到晚上10点左右结束。在《吴县革命斗争简史》上，还有这样的记载，1936年，“七君子”被捕后，关在苏州看守所，黄埭乡师学生周建平等四人冒着被开除学籍的危险，到监狱探望慰问沈钧儒等七人。他们是群众自发慰问七君子最早的一批。

（史料二）1938年10月，周建平加入共产党。在黄桥决战最后的追击任务中，他率领连队机智地从侧翼迂回到河边，猛然杀出。顽军过不了河，纷纷跃入水中，被打死、淹死者不计其数。战争年代，周建平作为主力团的团长，很能打仗，粟裕多次表扬过他，解放战争的七战七捷，第三捷保卫淮安，周建平当团长，他那个团只有一门迫击炮，却顶住了敌人六个旅的进攻，血战了四天。政治部一个处长专门到前线来传达说，粟司令说了，你们打得很好，很顽强，很灵活。战后受到华中军区七位首长通报表扬。

为什么这样冒着生死？就是追求革命。在我指挥的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不是几十几百，而是几千几万啊，他们的骨头已经成灰，而我还活着。我提着脑袋参加革命，在做统一战线工作时，几次差点被敌人杀掉。曾几次负伤，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为了推翻蒋家王朝，我参加革命不是为升官发财，确实是一心一意为党尽义务。半个世纪过去，我还一直记着入党时组织上说的话，你成了共产党员，没有任何特权，只有为党的事业尽义务。这话十分深刻，成了我的行动准则，影响到我的一举一动。直到现在，我虽然有天大的冤屈，至今仍受着不公正的待遇，但我依然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相信党相信群众，也相信自己的问题一定会搞清楚。

我对党忠心耿耿，我承认我在工作中有错误，甚至严重错误。但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我没有对党做过亏心事，更不可能参加反革命政变的阴谋。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

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帮助我们的党把我的问题弄个水落石出，否则，我死不瞑目！

~~~~~

## 【回首文革】

迟泽厚访谈（节录）

• 叶曙明 •

叶：您认为文革分几个阶段？

迟：我认为文革分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是从1966年五一六通知，到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以前，大致上可以称为破四旧阶段，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阶段。这一阶段的主力军是红五类，也就是保守派的社会基础。全国有两个有名的代表人物，一个是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一个是谭力夫，这两人提出了血统论。这时打击的是地富反坏右这一批人，抄家啊，杀人啊，干得很来劲。社会乱起来了，学校停课了，红卫兵组织起来了，党政机关也开始不那么灵验了，文化大革命被提到日程上，全国人民都卷进去了。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开始形成一个气候了。

到了上海夺权以后，就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以造反派为主体的。批判反动血统了。血统论就是要保护旧的官僚体制，维护旧秩序。毛泽东说17年形成了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要把这条黑线彻底搞掉，就要冲击各级党委。结果贺龙被关起来整死了，刘少奇也关起来了，大部分高级干部都被打倒了。红五类以前骂别人是狗崽子，现在自己变狗崽子了，马上偃旗息鼓，灰溜溜了。

这时造反派起来了。造反派是不讲出身的，当然也有干部家庭的，但大部分不是。我记得1967年5月，黄永胜、温玉成在军区接见华工红旗的头头高翔，当时就有人揭发，说高翔的父亲是13级干部，在当时算是高级干部了，是一个进出口公司的副总经理，相当于厅局级干部，所以他（高翔）不能当（群众组织）一把手。后来连周恩来都过问此事，可见当时大家对高干子弟是很忌讳的。高翔的父亲算是最大的干部了，当时一般市民家庭、工农家庭可以（参加造反组织），高干不行，臭了。高干子弟差不多百分之百参加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他们是打砸抢的能手，可以说杀人不眨眼，抄家啊、打啊、破四旧啊、砸啊、烧啊，干的是这些。抄地富反坏右、抄民主人士、抄国民党漏网分子、抄资本家，他们有积极性，你叫他打省委、抓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他不干。1967年1月造反派起来后，他们就成对立面了。

叶：广州主义兵和军区的关系一直不错吧？

迟：主义兵都是军区领导的子弟嘛，像七中、铁中、八一中学都是军区领导的小孩在上中学。那时军区领导的孩子都在上中学这个档次，上大学是个别的。主义兵（和军区）有这样一个天然的联系嘛。后来都偃旗息鼓，躲到家里了。

叶：广州主义兵杀人与外地相比，不算多吧？

迟：广州总体来说，比较注意政策。广州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死人最少的一个城市。社会上很多人胡说八道，上次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XXX写了一篇关于广东文化大革命情况的东西，千把字，拿给我审稿。列举了一二十条，说军区和林彪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啦。我看了以后不客气地说：这些事情一件都没有，完全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甚至是颠倒黑白的。这是第一。第二，你写地方志，就写地方的问题嘛，军队支左做了什么错事，你可以写，但你写军队的事

情干吗？又是军队印了多少万本林立果的小册子啦；又是林立果到哪个工地搞什么活动啦；又是军队给林彪修了什么房子啦；又是9月13日那天出动演习，形迹可疑啦。我说这些事由军队查去，和你有什么关系？全都是牵强附会！

军队天天训练，9月12日训练没事情，9月13日就不行了？9月13日不训练，军队干什么去？都关在营房里？躲在营房里不是更成问题了？你躲在营房里干什么？是不是在等候命令？这是胡闹嘛。说9月13日有一趟军列进入广州，这军列天天在运，军火天天在消耗，当然要不断补充了。兵工厂在北方，在三线，当然要往广州运，不是广州往北运。那都是胡说八道嘛。

我是广州市志军事志的主编之一，最后定稿也是我定的。写到文革那一段，我就坚持这个原则。广州文化大革命的损失在全国是最小的。全市死亡在全国更是微乎其微。武斗发生最晚，清理最早，死伤最少。湖南（1967年）6月份就死人了，广西更早，广州到7月下旬（才死人）。总说广州是面临港澳，情况复杂。这么一个大城市，二三百万人，才死了200多人，在全国算什么呀？湖南死多少人？江西死多少人？广西南宁一次死几百人，广州一共才死两百人，连那些被当成监狱逃跑人员（劳改犯——叶注）打死的吊死鬼也算了，也就两百人左右。而且大部分都属于两派武斗中死的，真正抓到后凌迟刀割的，基本上没有。如果不是广州军区在这里，管住这个局面，那还不乱套了？

叶：1967年二·八冲军区的事件是怎么回事呢？

迟：这文革第二阶段是造反派当家，冲冲杀杀。开始对着党政机关，后来不过瘾了，就转向军队。为什么要冲军区呢？就是因为军队支左，不支持造反派，支持了保守派，所以就到军区造反，把军区包围起来。既有地方的，也有军队的，地方的就是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都是些知识分子。这知识分子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珠影有些演员、编导，要保自己过关，为了活命，就不惜踩着别人。他们包围着军区，用半导体喇叭——那时还是一种新科技——开着宣传车大声叫：希望解放军掉转枪口，对准你们的指挥员。这是我亲耳听见的。

军队里的也有，主要是文艺团体，歌舞团的、文工团的、体工队的，小知识分子，都是过去不受重用的，这些人也容易煽动起来。2月8日把军区包围起来了。后来中央军委下了命令，这才撤离了。

叶：那时军队的文艺兵已经搞起群众组织了吧？像千钧棒。

迟：搞起来了。千钧棒人不多，只有十几个人。

叶：军区机关有没有搞？

迟：广州军区的机关是全军最稳定的，军区的党政机关没有群众组织，一直比较团结。个别人有看法，有活动，但整个机关是团结的。司令部的重大决策基本上都没有泄露出去，如果分成两派，那还有什么重大机密？都荡然无存，没有机密啦！

这是造反派最风光的时期，持续到1968年7月。这时刘、邓、陶司令部已经被彻底打倒了，造反派的使命就完成了，他们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可这些人的头脑继续发热，据说蒯大富还拉了个班子，准备筹备九大呢。这件事是康生讲的，康生这个人虽然经常撒谎，可这件事蒯大富是做得出来的。他们觉得自己在共产党内占个一席之地，是理直气壮的。

到1968年对广西的七·三布告为标志，造反派从此以后就一蹶不振了。一个七·三布告，一个七·二四布告。七·二四布告是对陕西的。从1967年1月开始，军队一直不敢行动的，包括军区站岗哨兵的枪，都没有撞针，没有子弹，是用来装样子吓唬人的。军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死不开枪。军队是不得不干这工作，勉为其难，夹在当中很难受。部队不断有伤亡，被造反打死的也就打死了。

8月23日那次冲军区最严重了，连军区作战大楼都占领了，就是作战室没敢进，趴在窗户看看，里面确实挂满地图，门口写着“机要重地，闲人免进”，关着门。就这里没进去。温玉成还真躲在里面，躲在作战室的电话楼里。其余大楼都进去了，连红旗都插到楼顶了，造反派确实嚣张。警卫员徒手挡住他们，不让他们上，他们五六人抓住一个战士，一拖就拖出去了，他们的人源源不绝，几千人上万人都进来了，你一个警卫连堵住楼梯口，拖一个少一个，拖一个少一个，最后毫无办法。如果军队可以开枪，一个排可以打一万人，但不行嘛。七·三、七·二四布告以后就不客气了，真开枪了，造反派马上就老实了。

7月26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五大司令，蒯大富、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狠狠地批评了他们，说他们既不斗，也不批，也不改。他们五人联合发表了一个认错声明，然后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以那为标志，造反派从此完成历史使命了，以后陆陆续续被抓起来了。这就是第二阶段。

叶：文革中有很多事情至今仍讲不清。

迟：能讲得清，怎么讲不清？是不想讲清。现在有档案在，有人在，怎么会弄不清呢？有很多禁区不想弄清。九·一三事件搞不清？林彪事件那么多活口都在，那么多材料都在，怎么搞不清？搞得清，就是不想搞清。我举个例子来讲。1975年由《南方日报》发起，批判前省委主要领导人，实际是指刘兴元，说他反对江青同志，反对由江青倡导的样板戏创作路线，提出要走自己的路。谁打头呢？把红线女推到了第一线。

有这事情吗？根本没有。刘政委在省委会议上讲过要走自己的路？刘兴元是非常谨慎的，他能这么说吗？哪有这个事情啊？有没有在军队讲过？军队也没有！军区文化部长都很熟啊，哪有这事？可当时铺天盖地，《南方日报》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批前省委的主要领导，就是配合四人帮的政治需要，要整广州军区的某些领导。半年以后，四人帮垮台了，江青的三突出也受了批判了。如果刘兴元当年有这个发明创造的话，刘兴元不就成了反江青的英雄了吗？可刘兴元照样臭。你说想不想搞清？肯定是不想搞清，需要就给你扣上去。江青倒了，刘兴元还是无声无息的，也没说他反对过江青，倒是说刘兴元他们在林彪垮台以后，又一头扎进了江青的怀抱。

叶：周恩来1967年4月在广州的讲话，对广州文革有什么影响？

迟：1972年基辛格访华前夕，中央集中了一些人在北京钓鱼台，整天准备材料，军事方面的、外交方面的。总理的顾问班子、外交部的老领导干部都在。周恩来的秘书钱家栋——就是1967年跟总理来（广州）的那个秘书，他的名字叫家栋，“家庭的栋梁”，有四旧意识，文革后期到外交部当大使时改了个名字叫嘉冬——钱家栋见到了阎仲川，就凑上来对阎仲川讲：“唉呀，总理叫我向你说个话，总理讲，67年4月那次啊，他在珠江宾馆讲话，那时候啊，他要不表那个态就好啦。”

叶：这话是1972年讲的吗？



迟：是1972年大概1月吧，因为2月份尼克松就来了嘛。这就说明总理当时在珠江宾馆的那个讲话，很多是违心的。调子是中央文革定的。那时很多材料是中央文革广州记者站的记者给总理提供的，其中的记者五花八门，既有新华社的，也有军队调来的，那些记者都是极左分子，其中有一个政治学院姓姜的，浙江人，他是主要的。好像还有一个女同胞韩舞燕，驻香港特派记者，写了长篇文章。他们在广州采访广东文化大革命，这些人我不具体评论，但谎报军情、煽风点火的事情干了不少。

比如七·二〇事件以后，8月13日我到了北京。杨成武和黄永胜关系很好，都是原来红一军团的嘛。杨成武那时是军委办事组组长，跟毛泽东到南方巡视。中央文件他都看了，他悄悄地把他情况简报给黄永胜看——黄永胜经常往杨成武那儿跑——黄永胜拿回来，我就看到其中一份，是反映广州军区对七·二〇事件的反应。七·二〇事件是个测温表啊，你什么态度？对武汉事件你拥护谁？是拥护三钢造反派，还是拥护百万雄师？是同情陈再道，还是拥护谢富治、王力？这是不能含糊的。这个驻广州记者写得很厉害，说七·二〇事件传到广州后，广州革命群众组织——就是说旗派了——怎么样同仇敌忾啦、义愤填膺啦，对百万雄师反革命保守组织怎么样愤慨啦，怎么样对谢富治、王力同志表示敬佩啦，什么慰问啦等等。“我们也到了广州军区大院，令人不解的是，广州军区营房的墙上，却见不到一张拥护中央对七·二〇事件指示的大标语。”

这家伙没有直接说你广州军区怎么样坏，就像说廉颇一饭三矢，一顿饭拉三泡屎，还能上阵吗？这廉颇的前途就被葬送了。我很纳闷，广州军区表了态了呀，不对呀。我回来一看，（军区）墙上还写着“向谢富治同志、王力同志致敬”、“拥护中央对七·二〇事件的英明指示”呢，敢不表态吗？

叶：是新华社记者写的？

迟：就是中央文革的记者，刚才说了，来自四面八方，有新华社的，也有从一些大学调来的，也有从军队调来的，都打着中央文革记者站的名义，其实什么人都有。哪个人写的我不知道，但像这样的简报报上去，让上面的人看了作何感想？这不是害了你吗？记者就干这种事。

所以，总理（在珠江宾馆）那个座谈会，总理就是听他们的，他们提供的材料，一叠一叠，一口袋一口袋的。当然总理不会完全被他们蒙蔽，有时晚上听他们的，白天总理就在留园听军区常委们的汇报。他是兼听的，但最后的表态是中央文革定的调子，哪个保，哪个革，总理是不能讲的。

叶：总理回到北京以后，还打电话到广州，对一些提法作了更正。

迟：是的。原来讲的更激，就是保守组织，后来更正了，就是思想上偏于保，而且他们有那么多人，还是要以教育为主。就没有用原来那个话了，原来那个话让造反派抓住更不得了，用这个来压东风派，东风派就更艰难了。就在他（周恩来）回到北京的当晚，又叫他的秘书周家鼎给广州军区打了电话，对他离开广州前的讲话作了补充和修改。来电特别指出，东风派的两个最大的工人组织，是广州工人的革命组织。这就定了个性。

那时的造反派分几个等次，叫做无产阶级革命派群众组织，也叫造反派组织，是响当当的；革命群众组织是中间派，不死不活的，可以不打倒；再就是保守组织。后来总理发明创造出“思想上偏于保守”。所以后来就叫东风派“偏于保”。偏于保还是保，也还是要打倒。七·二〇事件以后就压军区，一定要把它打倒。保守派是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的社会基础，从理论上讲是敌我矛盾，是要镇压的。

对总理在广州的表态，应该说，广大群众组织是不满意的，军区领导是表示遗憾的，但也有它的好处。他没有把这些组织说成是保守组织，军区以后就守住这条线，总理已经讲了，他们只是思想上偏于保守，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就反对把他们瓦解。这就比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强多了，那些地方对保守组织是格杀勿论的，打得家破人亡，因为他们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基础”啊。广州就紧紧守住总理的这条线，对这些人还要教育、争取、团结、改造，他们（造反派）就没话可讲了。从这点上讲，总理还是留有余地的。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下，他没有完全按四人帮定的口径做结论，这是不幸中之大幸。

叶：军区支左的指导思想是怎么样的？

迟：（文革）第三阶段就是从七·三、七·二四布告到九大前后。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基本上就是尾声了。以后说文化大革命是76年结束，那也是一种算法了，但基本上没有暴风骤雨式的大运动了。

这时右倾保守派抬头了，造反派倒了，保守派自然就扬眉吐气了。革委会在此之前已经陆续建立了，广州的革委会是1968年2月21日建立的。当然，建立起来以后没有权威，他们（造反派）要冲就冲进来了。从七·三、七·二四布告以后，造反派就老老实实了，你不听话的，真抓；你要敢动武的，真打。造反派都非常现实，过去放纵他们，他们当然厉害了，你只要不放纵他们，他们最老实了。

文革分这三个阶段，两头是保守派为主，中间是造反派为主。闹得最凶的是造反派，时间也比较长，一年多吧。广州市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这个总的格局下发展的。

军队介入文革以后，第二阶段开始，就不断地受到冲击。那真是疲于应付，可以说是狼狈不堪。军队的政策、纪律观念是很强的，你上面要支左，我当然就要去支左了，介入群众运动中去。但支持谁？为什么支持保守派？主要还是根据上面。几十年所受的教育、实践经验，什么叫群众？不就是劳动人民吗？到这些组织一查，他是工人，他是农民，他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个体劳动者，这个组织不错，都是正经人；他们拥护共产党，感谢共产党，政治态度好；拥护解放军，支持解放军，那（解放军）当然支持他了。造反派不是，他们来了以后咄咄逼人：你们对赵紫阳什么态度？你们对旧省委什么态度？你们对镇压群众的反动路线什么态度？对军队怀有很大的敌意，训斥、责难，军队能有好感吗？像黄永胜接见造反派头头，武传斌在黄永胜跟前，叼着个烟卷，有点称兄道弟的味道，根本不放在眼里，很自傲，军队对你能有好感吗？所以军队必然支保，开始都支保。

后来中央文革一再指示：你们错了。毛泽东讲得更形象，你们不要“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尽管这么说，但很难改，思想上还是倾向保守派。你不是说群众嘛？群众就是多数人嘛！可后来毛泽东讲了，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大家就不理解了。不是说要和多数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吗？群众总有个量吧？这就拧不过来了。

军队在支左问题上，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前，广东一直是坚定地、非常明确地支持保守派。七·二〇事件以后，理论上讲，要改变态度、端正态度了，要支持左派群众了。但是，形势稍微一变，广州军区马上又提出来，要一碗水端平。而且这个很快《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承认了。一碗水端平总不能说错吧？用一碗水端平来抗拒支持左派这个上面的指示。

应该说，自始至终，广州的支左，对两派一直没有采取有的地方支持一派，镇压一派，像湖南最后出现的那个情况，像四川出现的情况，更不用说像上海了。没有出现这情况。开始支

持保守派，后来上面讲要支持左派，不支持不行。特别出现武汉七·二〇事件，表示要支持，但并没有完全支持，对保守派也没有把它压垮、解散。七·三布告以后，造反派倒霉了，被整下去了。这时，广州军区以刘兴元为代表的领导班子提出来，只要他们（指结合进革委会的群众组织头头——叶注）自己不坏事做绝，就叫他自生自灭。也就是保留他的位置，没借这个机会把造反派整下去，你当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还继续当；你当省革委会常委的，还继续当，让他慢慢地自然地消亡，也没采取组织措施。所以广东两派比较稳定，没有大量死人，1969年以后再没出现群众对立场面。这应该归功于当时的军区领导，在对待群众这个问题上比较谨慎。

叶：广州空军的支左是不是也由广州军区领导的？

迟：广州空军、海军——海军机构不在这，它有基地。后来怕口径不一致，在七·三、七·二四布告以后，在宣传的时候，三军联合组织宣传车。军区有权威，空军、海军基本上按照军区的指示办。

叶：省革联时对军区冲得比较厉害，到1967年8月份以后炮轰军区，也搞得比较厉害。

迟：炮轰就早啦。我记得1967年6月6日，中山大学八三一战斗队就登了小报，“炮轰黄永胜动员令”。那时批二月逆流，全国以谭震林为代表，各地都有谭震林式的人物嘛。广东的谭震林是谁呢？就是黄永胜嘛，“抓广谭”。有一次在北京汇报，戚本禹当着周恩来的面问黄永胜：黄司令，现在抓广谭啦，谁是广谭啊？是不是讲你啊？戚本禹也是得意忘形。抓广谭实际上就是抓黄永胜、刘兴元。有人说广谭是代数的X，X就是任何值，你反对中央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政策，你就是广谭。这是胡说八道嘛，广谭还是要有对象的，第一个对象就是黄永胜。

叶：当时军区是怎么应付这种炮轰军区的局面的？

迟：由你轰，你轰吧，没办法。小报到处出，我们也买小报回来看，也找一点给黄永胜看看。“炮轰黄永胜动员令”就给他看了嘛。

我就说这一条，广州不但生产没停顿，生产形势在全国是最好的，广东历来是从外地买粮食吃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还支援了粮食部（？），一次支援几亿斤粮食。粮食、油料都上调的。拿交易会来讲，只有1967年10月份那次推迟了一个月，应该10月15日开，推迟到11月15日。其他每一次都是照样开，那么多外国人，没有出一个伤害外国人的事故。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了。你不能拿今天改革开放的情况来对比，那时候人身没有保证，动不动就拿枪，广州抢枪抢了一万多支，随便杀个人还不容易吗？杀个外国人制造点事端还不容易吗？可交易会照开，生意照做，外国人没有伤害一个，没有点工作基础，没有点力量，没有点政策，行吗？文化大革命既然整个是在错误路线领导之下，当然无功绩可言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但辩证地讲，成绩还是有的，损失少就是成绩。打仗谁都失败了，但你全军覆没，我只损失10%，我就比你全军覆没的强嘛。你要提拔应该提拔我这个10%的嘛，不能说打了败仗，都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能这么说的。为什么你全军覆没，我还保存了90%呢？为什么你6月就大批死人，我拖到7月底才死人呢？就是工作不一样嘛。还是有差别的，差别还是很大的。要说政治局面哪都没广东复杂，人头也是，中南哪个城市也没有广州人多，但广州出现的问题相比较少。

叶：军区对八一战斗兵团的处理，从开始取缔，到后来平反，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

迟：对八一战斗兵团，是抓住它成分不纯这一点，取缔了它。军区（因此）犯了路线错误。八

一战斗兵团造反太强了，它是造反派里的骨干组织。对学生组织军区不好抓，八一战斗兵团是社会组织，第一它跨行业，第二它有假复员退伍军人。当然也有真的复员军人，莫竞伟（八一战斗兵团的头头——叶注）确实是复员军人，但这人行为不端。（军区）抓住他，调查这个组织有多少社会闲杂人员，有多少在部队犯过错误的，调查回来一汇报，就决定趁着军管这个东风取缔它。

后来这些人不服，旗派抓住这个事情反复地攻。到底给攻下来了，给平了反。当然这个组织到最后也没成气候。因为这些人都是在社会上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不太高，没受过好教育，跟在学生后面冲冲杀杀的。军队一介入文化大革命就取缔它了。中山大学的一个工人组织，叫什么工人赤卫队的，也是抓住它这个，牌子也砸了，门封了。我亲自去了嘛。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革造会）的工人当然鼓掌欢迎了，广播站高声广播，赞扬军管会的行动。

在谈到军队介入地方文革时，迟说：

军队真正介入文化大革命应该是1967年1月23日，毛泽东对安徽造反派的批示：“人民解放军应当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因为安徽要批斗省委书记李葆华，南京军区（似应为安徽省军区——叶注）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要求军队组织警戒。南京军区接到安徽省军区报告，不敢怠慢，马上请示中央军委，毛批了：“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军队接到命令了，要介入文化大革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回避了。军队过去是很谨慎的，不能干预地方党委的事情。但这时地方党委实际上已经基本瘫痪了，政令不通，赵紫阳这帮人已经是躲躲藏藏的了。

在这之前已经感到一点苗头了。除了电台工作组外，应该说，我是军区最早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我是秘书科副科长，是首长的参谋、助手，当时文革席卷全国，对军队的冲击很大。首长也很关心，我要向首长提供一些情况。1月23日的指示下达前，阎仲川叫我去了解地方文革的情况。我就代表军区去找北京三司驻广州联络站了解。北京三司是清华井冈山蒯大富那一派的，联络站在广东工学院。

1月23日的指示下达后，就不需要再遮遮掩掩了，我们到处去调查。广州名气比较大的造反组织都去了，像地总——就是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后来周恩来说，名字这么长，就叫地总吧。莫超海是名义上的总理（管），他是广东人，比较斯文一点；孙亦武是江苏人，复员兵，广州氮肥厂的，他是武斗司令。这些组织我们都去了。

军队介入文革，广东应该说是没有思想准备，是奉命行事的。到了1967年1月一月风暴以后，军队就坐不住了，特别是1月23日的指示下来后，军队就要介入了。紧接着2月北京开生产会议，要军队出面抓生产，因为省委、政府都瘫痪了。广东省就由陈德出面了，他是省委常委，又是省军区政委，当然责无旁贷了。

陈德去北京开会。赵紫阳也去了。他们回来还议论，赵紫阳虽然是走资派挨斗了，但到北京还照住京西宾馆的套间，陈德是实际负责的，却只住单间。上面对赵紫阳还是以礼相待的。会上要军队抓生产，成立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那时还没有实行军管。到3月初，内部就下通知了，广东要实行军管。3月15日就全省实行军管了。广东省、广州市同一天挂牌成立军管会。

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全国几乎没有例外，军队只要一介入，支持的一定是保守派。什么叫保守派？就是以工农为主体的，比较拥护、支持、接近党政机关的，主张小修小补的，也就是过去说改良的这么一些群众组织。他们拥护文化大革命，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参加文革，但你说要打倒广东省委、打倒广州市委，他们就感到过头了。撤换某个领导可以，但如果说整个都是黑线，他们就接受不了。

~~~~~

【历史一页】

东湖风云录（之一）

• 徐海亮 •

第一章 武汉丙午年的春夏

1966（丙午）年，武昌东湖早春降临，气象更新，垂柳婆娑；湖面静静映照着绿荫簇拥的毛泽东居住的“白云黄鹤”地方，乳白色的平房隐现在水杉马尾松、棕榈广玉兰、桃梅竹丛中。湖西，是湖北省委、政府的一片红砖灰粉建筑，以及党政军领导居住的茶港小区；湖南岸一珞珈、桂子，绿染岗峦起伏，金黄琉璃点翠，为参差不齐的高校房舍，早就说如今名山“学占多”嘛。看丙午艳阳下的东湖，真也是“春和景明，波浪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难怪朱德诗称此处美丽静谧赛过西湖；实属人间一仙境。

以陶铸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在人们印象里是十分紧跟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突出政治思想的。1966年春，中南局的机关报《南方日报》频频发表赞扬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顶峰”的宏文。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当地干部、工人和学生眼中，抓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比较得力，是才华横溢的少壮书记；他曾多次到武汉大学和其他单位做政治形势报告，大学生眼观、传闻，仰慕十分。湖北省贯彻中共中央精神也很及时，1959—61年间的“三年困难时期”也早已度过，经济恢复，人气上升；据说关于农村社教四清的双“十条”和“二十三条”的制订，湖北也都是中央的得力支柱和试验场地。

一切似乎平和惬意。谁都没有料到在1966年，湖北省委与民众间会出现芥蒂乃至冲突。

一、文革风起东湖之末

文化革命烟云刚刚升起，毛泽东在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后，就于1966年元月12日，对陶铸、王任重、张平化谈到应该大力突出政治，批评不少人长期重业务轻政治，谈生产津津有味，面对阶级斗争懵懵懂懂。毛的批评自然连带湖北；“为了从根本上扭转毛泽东的印象，1月24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委常委会议上讲话指出：现在农村有许多地方是工分挂帅，不是政治挂帅，许多工厂、企业单位是奖金挂帅，其实是物质刺激，对这些不合乎毛主席思想和生产发展的制度都可以改……毛泽东读了这个讲话，十分赞同”。2月25日，毛写信给刘少奇说“此件请你看看，是讲政治挂帅的”。27日，刘将王任重讲话批转给其他中央领导；4月10日，中央又加批语转发了王的讲话。此外，毛泽东还在丙午立春前夕，将自己在1962年7千人大会的讲话稿，请王任重阅读并“请考虑加以修改”（毛对秘书田家英的整理很不满意）；立春当日，王建议重印此讲话。2月6日，毛在王的建议信上加批语，请彭真与在京常委及康生等人修改后印发给县团级领导同志看，并说“王任重的修改是好的”。

几天后，彭真与中央的秀才们到东湖客舍向毛泽东汇报文革提纲（即《汇报提纲》，人称“二

月提纲”)，毛专门通知王任重参加听汇报，并参加彭真主持的讨论毛讲话稿修改的会议。2月12日，该重要讲话就批发到全党。回头来看，在毛泽东的关爱和提携下，当时王任重离文化革命权力核心的中央秀才群体仅仅一步之距。

陶铸、王任重于3月17到20日，参加在杭州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六个中央局书记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性做出估计，点名批评了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和田家英的问题。王任重后来在日记里谈及毛的讲话，“讲古比今，要我们的同志们不要优柔寡断，要大胆，不要顾虑多端”。他对中央高层的斗争和毛的意图还是比较清楚的。

4月13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中南区学术研究座谈会”做重要讲话，阐述文化革命形势、任务。其中还专门指出在中南地区挑选显要的批判对象，武汉大学李达校长就成为一个可能的选择。湖北省委也按此精神推动本省的文革运动；4月18日，湖北省委派出工作组进驻武汉大学。应当强调的是：从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研究角度严格看来，武大工作组是全国第一个文革运动的高校工作组（相比较而言，中共中央理论组于5月17日向北大派出调查组，中共华北局和北京新市委于6月1日向北大派驻工作组）。

也就在这段时间，王任重在阅读报刊批判吴晗文章同时，也把自己在1962年在《湖北通讯》（增刊）发表的两个读书笔记找出来，“审查一下，发现其中也有一些糊涂观点或者错误的观点”；本着“在斗争中学习，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把一切落后的、陈旧的、错误的东西，通通从自己头脑里清洗出去”的愿望，以及四清中提倡的“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的精神，王将1962年读《资治通鉴》的读书笔记序言二则，重印刊于《湖北通讯》5月14日增刊之上，前冠之以署名短文“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签发时间为4月19日，可能是临赴杭州前）。平心而言，大家读《资治通鉴》是毛泽东带头、提倡的，一些省区领导受其影响，欣然从之；湖北省委当时也是群贤毕至，秀才荟萃，除王书记外，其他多人也一时兴起研读史书热潮。王在短文中，说当年发表读书笔记目的是使干部增加一点历史知识，也为了“使干部懂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正确挑选干部，以及发扬党的民主的重要性”，实际上仍是“资治”之用。不过，“现在看来，当时不写这种读书笔记，而强调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好了。湖北省委是一贯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但是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认识水平”。

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来看，王任重同志在文中的确有自我批评和自我革命的愿望，同时，也不能不看到，这位文革运动的左派领导人，也真被大家和自己共同祭起的革命大旗吓了一跳；当时，对以往时局有过一些想法，对历史有过联想，写文章发过种种感慨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无不因为对北京“三家村”的批判，扪心自问：自己有无右倾情绪和错误言论？这是实话。后面谈及的陶铸同志在广州万人大会做自我批评，也是一例。

4月19日，王任重再次参加杭州会议，倾听毛泽东在20、22、24、25日的系列讲话。2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吴晗问题“朝里有人”，矛头直指中央。王任重于29日的日记明确地记录了毛严厉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会后王还对陈伯达说主席讲得很好，很重要，是否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全党？可见他对毛泽东当时斗争意向理解是不错的。几次杭州会议讲话，当时都仅仅在党政高层传达，后来运动搞开，造反红卫兵才将其传抄到全社会了。

会毕，王随即回到武汉。4月25日，湖北省委召开会议，既然北京是从诸如“四条汉子”与历史学界的老革命文化人批判起，王任重断言，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文化教育界，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要针对知识分子，文革的结果之一，就是要查出占总数5%—10%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作为新的右派。

5月9日，陶铸在中南局省市委宣传部长和新闻、教育单位负责人会议上部署文化教育界的革命批判。中旬，湖北省委在高等院校传达中南局宣传文教口关于文革运动的精神。

王任重和陶铸参加了毛泽东的系列高层会议，王还参与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汇报活动，聆听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也在日记里记载和回味了毛的关键思路，内心对毛泽东其人也是崇拜备至的；不过，中南局的文革左派领导们，却自然地将文革运动的矛头，直指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这可能也是绝大多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共识。

5月5日，毛泽东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由是观之，毛泽东眼里紧盯的是中共党政的各级领导。

当时中共中央516《通知》就明确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同时批判这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5月19日，陶铸按中央516《通知》精神在中南地区文化革命动员会讲话，部署运动；即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万人动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作报告。这次动员会主要是传达贯彻中央刚刚通过的《516通知》和中南局全体委员会的精神，强调“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政府和军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不过，在讲到“共产党员必须同一切剥削思想彻底决裂”时，出乎在场人们的意料，陶铸公开地诚恳检讨了“（自己）没有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而是想通过一些具体政策和经营管理的办法去巩固集体经济……这样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助长了搞自发、闹单干的倾向。”陶铸还说：“自己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认识更差。1961年到1962年，其中有一段时间我产生过右的摇摆，主要表现在1962年春天，田汉在广州开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我在会上那次讲话，基本上是错误的……讲创作自由过了头，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也估计过高。那次讲话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我要负责任。”陶铸一则响应了当时时兴的“保晚节”的提法，二则自己内心好像也在反省，是否自己也有过右倾偏向，这里事先做些自我批评。

联想起王任重在一个月前的书面自我批评，不能不看出当年这些文化革命左派领导人，在新的政治风暴来临时，多多少少的忐忑不安和实实在在的自我革命愿望。

5月23日，武汉市委根据“516通知”和正在中南局开会的市委书记宋侃夫的意见，决定发出《高举文化革命大旗，深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通知。5月下旬，湖北省委通知，传达“516通知”等5个文件（传达到18级以上党员干部）和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会议的精神。5月30日，武汉市委根据省委通知，要求各区、局，各直属单位党委立即组织18级以上党员干部听《516通知》等5个文件的传达。次日又决定将传达扩大到车间党支部书记一级。因此，到5月底为止，中共中央精神原则，业已传达到武汉高校、文化、党政机关，以及工矿企业单位基层。湖北省委在传达文件精神时，对具体运动如何安排，目前尚无确切文字资料和有价值的回忆可资说明，不过广东省委的布置可做一个参考：5月31日广东省委文革小组召开会议，区梦觉书记传达了省委的三点指示，认为派工作组已成当务之急：一要派出强有力的工作队到大专院校、文教厅局去；二要摸底查黑线抓出我们身边的小赫鲁晓

夫；三要把队伍排队，根据新的标准，划分左、中、右。

毋庸置疑，湖北与广东一样，首先把排队划“左、中、右”，清理知识分子里的“小赫鲁晓夫”放在当务之急。因为参加5月上旬中南局文革会议回来的高校领导，立即在学校内部署了政治排队、整理材料，到6月工作组进驻，各学校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运动对象和迅速完善的文字材料。今天，人们在严正批判“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荒谬”时，恰恰遗忘或回避了中南地区在18级干部传达《通知》精神后，立即出现的在18级干部以下，乃至在普通知识分子、大中学生、工人群众里搜寻我们身边的“小赫鲁晓夫”的天大荒谬与悲剧的事实。

到此为止，武汉学校的运动都在单位党委领导下有序进行，组织学生批判“三家村”，学校也未停课，不过文化学习的气氛日渐淡薄，书桌难以平静，学生革命热情迅猛高涨，保卫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远不变的决心迅即坚定，多年来政治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积聚的能量即将迸发与释放。高等学校里，各班级在批判“三家村”会议的前后，总要高唱“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多数学生也认为一场反右派斗争即将来临，但“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武汉的一些工厂企业，这时还处在几个月前统一部署的四清运动中，就结合四清运动批判“三家村”。武汉重型机床厂原有一个党团领导下的工人文学创作组，组员李向阳等人写了大字报批评工会和党总支，结果被打成“三家村”。

李回忆说：“1966年春天的时候……我和朱鸿霞起草了一份大字报，内容就是说工会和党总支执行了错误的文艺路线和阶级路线，点了张志学的名字，说工会培养具有小资产阶级感情的人，现在看来点这个人是不对的，但是当时大家的感情是比较一致的，文学组的人全部签了名，贴在食堂的黑板边上。这样就不得了，成了武重厂的一颗炸弹，遭到当权派的迅速反击。本来从四清运动之后，我就成为他们找茬的对象，这下子又刚好写了这一张大字报，他们大概是感到机会来了，就抓紧出击。厂党委派工作组进驻文学创作组，从大字报开刀，把矛头指向我。每天下班都要到游艺室开会，把我写的东西，从前发表的小说和诗歌，都翻出来审查；还要我把日记本也都交出来供他们审查……当时给我上纲上得最高的也就是宣传小资产阶级恋爱观，因为我写了一些爱情诗和小说。在最高潮的时候，要求创作组的每个人都要发言批判。朱鸿霞和刘传福发言就说这样的批判不对头，也反对他们把批判上纲到反对社会主义的高度。这样就被当权派打成三家村，这个时候‘516通知’还没有出来。”

武重这些大型工厂批判普通工人群众的文革运动，甚至比高等学校还早了一步展开。

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及毛泽东决定公开转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前后，受到重用的中南局领导，进一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作用。6月1日，作为文革司令部的要员，陶铸奉调北京，负责中央文办工作，任中宣部部长；6月4日，康生、陈伯达看望刚到京的陶铸，交代工作，是日，北京新市委决定派出少量大学工作组。后来，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并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王任重则接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二、武汉大中学校轰然起火

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广播和印发，引起武汉高校的轩然大波。许多学校纷纷贴出大字报响应。6月2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一年级学生游华生贴出大字报，批评院党委对运动缺乏热情，华中工学院则流传：北大有鬼，我院也有鬼。6月3日，湖北省委及时指示各大专院校党委，有必要取得学生思想的统一，要积极掌握运动的主动。在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消息公布后，广州地区的高校学生冒着豪雨上街游行，欢呼庆祝；林李明书记认为这是不合法的行动，应予劝阻。南国红棉花似的热情盛过武汉；好在武汉学生还比较循规蹈矩，没有上

街，只是各学校均产生了对文革运动和领导做法的种种猜疑……。

最先研究武汉文革的王绍光《理性与疯狂》记录：6日，王任重之子王三宝（实验中学初三学生）模仿人民日报社论贴出大字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矛头指向某些教师。他还统计，武汉的中学员工里有40%出身自阶级成分不好的家庭，学校主要领导人出身不好的达到48%。另据该学校高三学生柳英发回忆：“武汉大学被省委打出了一个三家村。接着我们学校也跟着学样，打出了‘高宏、廖起叔、张庆圭’的三家村，他们都是初中部的老师，跟我们联系不多。后来才了解到他们组织了一个‘拓荒者诗社’，算是比较有才气的人，其实诗里面也没有什么政治色彩，主要是老师批他们。最后他们都成为坚定的造反派。在批‘高廖张三家村’的时候，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初中部的老师自杀了。后来才知道学校里组织批判‘高廖张’三家村的事情，与王任重的儿子王三宝的大字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有关，学校的当权派以为王三宝的大字报，就是官方关于文革运动如何开展的内部口径”。

形势发展很快，针对运动情况，6月7日陶铸给中南局电话指导运动：总的是快些写一报告，短些。此外有几个要点记录：1、贴左派大字报，也不要怕，给他撑腰。2、学校现在主要搞文化大革命，不能代替四清。将来搞四清还是分期分批搞。3、重点是大专学校和高中，初中不发动，起来了就搞。小学，肯定不搞。4、县以下，先搞一下声讨，教育，仍以学毛著为中心。同意紫阳意见。面上学毛著，搞一段。点上搞一段，结合四清搞。5、陈寅恪（中山大学历史系反动教授），生活不降，大字报不发动，贴也不干涉。批判要报中央。6、城市集中搞一段文化大革命，长期还是搞四清。抽点人，不要影响四清。7、龙舟，不去组织，搞新的文体活动。少数要搞，不阻止，变成体育比赛性质的。态度要明确，不搞龙舟，搞新内容的体育活动。8、湖北，请你同任重同志通一次电话，汇报一下。……鉴于情况多变，当日晚上，陶铸接着又发出电话指示：1、机关不要去市委给雍（文涛）贴大字报。在中南局内可贴。2、王匡要检讨后看看再决定是否停职反省。

对中南的党政领导来说，6月的7、8、9日是极度紧张繁忙的几天。7日，王任重给武汉大学文革运动欣然命笔，题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似乎在省委书记和多数学生心里，那时的运动还仅仅局限于教育革命。不过4个月后，造反学生就起来指责王的指示是蓄意将政治斗争引向“纯教育革命的歧途”。7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得知工作队已经进驻北大，便从湛江打电话给区梦觉书记，十万火急地催促：“北京已派出了工作队，看来广州也要迅速派工作队，加强领导，不要使运动没有领导。”广东省委遂发出《关于组织文化大革命工作队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立即从省级单位抽调九百人，组成一支高质量的工作队，分赴各高等院校帮助领导这场斗争，坚决把这些思想领域的重要阵地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彻底。”8日，王任重召集湖北省文化革命工作会议，并且重新提出1957年湖北省委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几点意见，作为当前文革运动的指导。

就在王书记用1957年反右精神指导运动的同日，武汉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学生杨家志，也下定决心公开批评王任重在“1962年的右倾”和1966年的企图“混关”。杨当时还在咸宁县四清工作队，作为工作队员，他读到王任重刊于《湖北通讯》增刊上引火烧身的“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颇认为书记同志有些“煞费心机来遮遮盖盖”，简直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于是直书王书记，从“仅仅是美化帝王将相吗”、“你忘了阶级斗争没有”、“不准散布历史唯心论”、“是清理，还是混关”四个方面，穷追书记的自我检查，认为王生怕触到事情的本质，并谈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激流中，来洗洗自己的头脑，这对我们都是必须的。你何乐而不为呢？你说共产党人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我们不仅仅和外界的一切牛鬼蛇神战斗，而且还要和自己脑子里的牛鬼蛇神斗。否则只会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尽管杨同学的信写得还是比较冷静和客气，仅仅是希望王书记自我革命，没有一棍子打死的意思，但在那时候读了这信，人们不能不联想王任重是否也是邓拓式的人物？这就是6月运动的大势，人们开始怀疑，但动机

相当良好，口气相对温和；邓拓的妖魔化形象也不引发群众和书记的惊悸。结果，杨家志同学被开除了团籍和工作队员资格，批斗一周，继而被打成“右派分子”。

6月9日，武汉二中学生贴出大字报《炮轰党支部》，消息在全市中学界不胫而走。省、市委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24小时内派出600人的工作组奔赴部分中学，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到这时，分赴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业已组织、陆续出发。6月中旬，省、市委紧急动员派出的各类文革工作组组员已逾万人。

6月11日，在杭州参加中央会议的王任重书记（此时王已是中南局第一书记），记下10日毛泽东对各大区负责人的讲话：“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仅从这个记录看，毛泽东对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尚无明确的标准，“一切牛鬼蛇神”何指？似不清楚。不过毛的斗争所向针对的就是党政领导，大学生在一年前已传达过“23条”，他们就如此理解中央意图；而王的实际理解并不如此，尽管他一再聆听毛的教导。王在湖北，以及离汉以后的种种指示，依然是按1957年的反右思路布置的；后来他做的自我检查交代，就承认了：“在6月10日前后一次中央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这次运动可能和1957年差不多，要打击三、四十万个右派分子’。这个想法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我是用1957年反右斗争的老经验来指导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的”。所以，在6月29日的日记里，他甚至还记下了要“接受五七年的经验教训（放的不够，反击过早），这一次沉住气，引蛇出洞好打”。

武汉不同于北京，省委工作组刚刚进驻时，武汉的大学生整体上是热忱欢迎的。如碧峡回忆（见碧峡：“波澜乍起——武汉水电学院的1966”，“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1966年6月12日上午，省委工作组的李凤祥组长，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传达了毛泽东主席最近的一个批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集中在院体育馆里的三千多听众，轰地一下站了起来，鼓掌，发出了长时间的“呵…呵…”的欢呼声。一种与天庭豁然贯通的神圣感，抽紧了我的心，我的眼角湿润了，而且感觉到，周围好些同学的眼边也挂着泪花”。

“工作组进驻水院的7天，是不眠的一周。水院像一堆干柴，轰然起火；沿校区大道匆忙树立的大字报栏，贴满了大字报。被意识形态斗争热浪和既单调——（但）又丰富的学生生活烘焙了数年的干柴，终于达到了燃点。同学们的狂热、兴奋程度，超过了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那些天，没有什么派不派，武昌的工人给大学生运来了白纸和墨汁，我们的洗脸盆盛满了浆糊；人与人也好像一下子亲近了很多。感情冲动，思潮澎湃，激情与热泪相融。公正的说，绝大多数学生们当时是信任湖北省委的，也拥护派工作组到学校指导运动，因为我们自己也刚刚做过工作组员；尽管李组长仅仅是中南民族学院的一位处级干部，但他代表了省委来领导运动，不少同学去找工作组，去述说党委领导运动的不得力，去述说自己的怀疑。尽管院党委没有靠边，但已有人写出大字报，说张院长、张书记、张副院长是‘张家村’，主抓教学的张副院长，自然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特别是党委宣传部胡部长，鉴于他的工作属于性质敏感范畴，多年来在干部、学生中，又颇有不良印象和一些颇为出格的言论，他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当时学生并不真了解学校的历史、人事内情，所列举的领导罪状，无非都是‘抵制毛泽东教育思想’、‘抵制文化大革命’之类，许多问题确实是捕风捉影。而我个人心中的文化革命，在1966年的6月，充其量是一场教育革命。

“有的大字报无限上纲，有的出现了谩骂与人身攻击，动不动把人名打上红叉叉……党委

领导在公开场合，什么也讲不出来。而且有口也似难讲清白”。

6月11日，武汉中原机械厂附属技工学校学生贴出大字报《敬告宋侃夫》，对市委表示不满；第一冶金公司附属第一中学学生，成立了“革命行动小组”。省市委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他们最直接的本能反应，就是学校里出了反革命分子。宋书记亲自去了中原机械厂，省委派出160人的工作组到一冶一中，力图压制造次的中学生。

运动中口号提法分歧带有普遍性，鉴于此，11日陶铸也匆匆指示中南局：“学校中提‘保卫校党委’口号是错误的，只能提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校党委是正确的，只能提‘拥护校党委’。”不过他的这个指示精神，并未传达到湖北基层群众，许多院校依然强调所谓“四个保卫”“四个紧跟”口号，因此也在中层干部、教师、学生群众里形成歧义和激烈辩论。不过，6月上旬的争论还处于概念阶段。争执往往是一些概念性问题。

13日，湖北省委公开抛出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全市有数十万干部、工人、学生到武大声援，美丽如画的珞珈山校园成了节日盛宴场地，武大成为省委运动的样板。官方组织的批判、运动，终于划出27名“黑帮分子”，内部掌握91人；武大党委常委13人，有9人被斥为“黑帮”。在1222名武大教职员工里，有227名被公开划为“黑帮分子”。

但是，一些学校也出现纷争，由于讨论参加省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人选发生激烈争执，湖北大学部分学生、青年教师在校内游行，派出代表到省委上告；这次行动被官方称为“小匈牙利事件”（群众称为“6.20”事件），并对湖大师生进行压制，在教师和学生中暗暗布置抓“右派、反革命”。墨水湖中学出现了“6.16”打人事件，王任重任在“情况反映”里批示“这不是一般的打人事件，这是比1957年汉阳事件更为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在关于安静街中学（后改称“要武”中学）和人民中学事件的“反映”上，王极为气愤地批示说“工作组无能，流氓学生这样猖狂，无产阶级专政到哪里去了”？

其时，北京大学“6.18”事件业已发生，当时中央也有了指示精神，湖北按图索骥。一些北京“反干扰”批斗学生的消息，也依借书信渠道很快传到武汉，大学生里已经多有传闻。

在省市组织下，热情的武汉工人、干部踊跃前来武汉大学声援；同时他们自己也受到高校文革的感染与启迪，实际上在6月份，工厂的运动也自然地启动，从“四清”和单纯批判“三家村”，进入了本单位实际。还以重型机床厂为例，祝孝先回忆说：“6月10日开展运动，毛主席号召大家起来造当权派的反，我还是在犹豫。当时我是专案组成员，分工是发动大家贴大字报，每天收大字报。一个技术员叫曾世贤，写大字报说我们支部有一条黑线。这个人自己出身贫农，他老婆是个日本人，虽然长期写申请，但是不能入党，他对党委和各级支部有意见，写了上十张。我去收大字报的时候，他要我看，还问写得怎么样。我没有什么文化，也懒得看，就随口说写得好。结果分厂党委书记任树桐找曾世贤谈话，问是谁支持他写这个大字报的，说没有人支持他绝对不敢写……曾世贤提到祝孝先说写得好。……6月24日下午两点通知我去开会党员大会。他们事先做好笼子，在小组上有意选我发言。其他小组的一致意见是说曾世贤的大字报是大毒草，要批判。我最后发言，说文革运动刚刚开始，才14天，现在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就讨论说大字报是大毒草，为时过早；到底党支部有没有一条黑线，下论断也为时过早，要到运动后期下结论，用事实说话。我说完了就回家，书记把其他党员留下来，发动党员写我的大字报，还说是祝孝先出主意叫曾世贤写大字报的。第二天我一上班，就发现从一楼到三楼全部是大字报，矛头针对我。我一气之下就跑到总厂，找监委书记徐洪山，党委书记储丹庭，拉他们到分厂来看大字报。我说自己又不是什么当权派，怎么把矛头对准我？这两个人就做任的工作，说不能把矛头对准祝，你们搞错了”。

该回忆还披露：厂里平时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和人事关系的矛盾，也被激化、摊开。

三、运动的铺开

6月运动铺开。13日陶铸电中南局：学生中不要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还是由工作组吸收左派教职员（包括党政干部中的左派）领导，可以开学生代表会听取意见，三结合。

是日，刘少奇同意并批准中南局、西北局提出的文革提纲发到全国，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而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此批示针对的正是中南地区文革运动的打算，中南的做法得到刘的首肯，且作为北京以外运动的一个样板。到后来学生才知道，6月运动全面铺开后，毛泽东主席从中南抽出的文革干将与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主席配合得很好。这是毛很不情愿看到的事实。

进入文革中央核心后的陶铸与王任重，在北京十分跟进中央对运动统一部署，对于中南地区运动，则比较稳重和小心翼翼，也特别关注底层群众的一些异常动向。

6月15日，陶铸电中南局：中央拟批华北局报告。并告几个初步意见：（1）农村，四清点，搞一段文革，结合学毛著，搞清思想。新点，从文化革命搞起。面上，学毛著为中心，搞一下文革教育和声讨黑店。（2）城市，工厂结合四清搞文革，不能代替四清。新点，从文革搞起。面上，搞一下文革，主要学毛著。（3）学校，不能完全齐头并进，但机械地分期分批也不行。文教系统，放手彻底搞。高考招生，推迟半年。学校，派工作队的，一直搞下去。派不出工作队的，也积极领导。（4）街道居民、小学、服务商店、派出所，现在不搞。小学将来采取集训教师的办法搞，现在可以搞声讨，不能靠小学生搞。派出所，将来靠集训办法。服务商店，下一步再定。

18日、20日，陶铸又电中南局：（1）新铺点，从文化革命搞起，清思想、清政治、组织队伍、搞当权派、是顺当的。这样，整个形势有好处……（2）学校，文化革命即是四清，全部在内。以后还有教学改革。关键是文化革命。（3）城市工厂，文革可搞深一些。（4）大专学校全面搞，有点有面。直属市，都要搞，不搞不行。四清地区学校要搞。面上，搞一段教育。……（8）（广州）八中，反动学生给左派教师扣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要处理。

可见，陶铸依然是按“社教”、“四清”以及1957年“反右”的部署来安排文革运动的。

在北京，陶铸15日也在高教部、教育部全体干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提到：“高教部首先有几个同志贴大字报，揭露了蒋南翔的问题。于是以蒋南翔为首的人组织反攻，围攻，另一方面对上级采取欺骗掩盖的办法，蒙蔽上级。后来情况弄清楚了，蒋南翔是阻碍文化革命运动的，不能让他继续担任高教部文化革命的领导人了，所以把他停职反省。”（按：群众后来批判说蒋纯属被抛出的）“当时我们觉得需要一个副部长来代理蒋南翔的工作，决定了暂时由刘仰峤同志代理。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是不恰当的，也是不正确的。你们不赞成，就是不恰当。什么叫不正确？多数人不赞成，就是不正确”。

“现在看来高教部的问题不是不大，而是很大。不仅高教部有问题，清华大学问题也很大。这个问题是什么性质呢？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统治了我们的高教部，也是占据了我们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过去高等学校招考，不管你家庭出身怎么样，不管你政

治上是反党的还是拥护党的，是坚决搞社会主义的，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都不管，只要你试题答得对，分数高就可以考取，就可以升大学。分数高不是很好吗？好是好，就是将来我们国家要变颜色，对资产阶级好，对无产阶级那是不利的”。“如果不能保证他们毕业出来忠心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忠心地搞共产主义，而是搞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一套，向往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有些人根本上就是坚决反共的，那么，我们的教育就不可能不失败”。“几十年以后，老的已经死掉了，大学生成了各个岗位的重要干部，领导干部，再加上少数野心家，搞阴谋，篡夺领导权，全国就要变颜色。苏联就是这样变的……”

“而现在我们推行的教育制度，教育方针，教育思想是同党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驰的。这不只是高教部，教育部董纯才所宣传的凯洛夫，你们要清算。在全国中小学中，凯洛夫的影响很深。只讲智育不讲政治，说德育就是政治嘛！特别是高等学校影响最大，因为高等学校毕业出来，不管怎样都要变成国家干部，……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不是忠心耿耿为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而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人，那再过多少年后，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就要变了。……我讲的是总的情形”。

现在来看，陶的“6·15讲话”，自然讲出了毛泽东当时对教育战线的一些基本意见，同时也是刘少奇当时得以承受的基本估计。6月北京高校和教育部的运动，依然是在刘的主导下进行的。刘与陶当时以为运动剥离出彭真、蒋南翔，清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达到预期目的了。高教部和清华的运动后来受到群众严厉指责和批判，但陶当时的本意还是要将运动在传统政治模式及文化教育范畴向前推进的。他自然没有意识到这仅仅是刘主席在毛的政治攻势下，不得已的战略撤退。颇具讽刺的是，这种教育革命的粗浅意图，抵制毛的文革政治进军的做法，在文革以后也依然属于不可容忍的“反文化”“革文化的命”的行径。

陶铸在讲话里也标榜中南局在对待毛主席著作问题上区别于中宣部的当然左派姿态：“我在中南局的时候，曾经写了个决定，在《人民日报》登了的。我们就是这样提的，今天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一般的学习问题，学不学毛主席著作，对于党员来讲，是有党性没有党性的问题，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中宣部理论处很反对，大讲‘你们杀气腾腾’。我们讲这个话，怎么杀气腾腾呢？这是真理嘛！这是事实讲出来的话，怎么杀气腾腾呢？”

按照省市部署，6月17日，武汉市委抛出市文化局党委主要领导程云，打为“黑帮”。后武汉报纸将所谓的程、吴的帮派称为周扬在武汉的帮派。武汉文化局有37人被拘留。团市委和学联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号召全市青年“积极投入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思想，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6月22日，陶铸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发出电话指示：1、学校的夺权问题很复杂，有整个烂了，整个改换领导；有局部烂了，局部夺权。也有敌人夺权问题，利用这个形势，以“左”的面目出现，夺权。北京大学的经验（按：指“六·一八事件”）很好，将转发。学校的情况复杂，可能有的要反复，夺几次才能搞清，也不要怕。广东的情况比较复杂，要注意。2、要强调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学校党委没有问题的，由党委领导；学校党委领导不了的，由工作队领导。要强调领导，不能使学校瘫痪。现在有的地方谁也不信，这不行，要告诉学生听工作队领导，听省委领导。对党团员要抓起来，不要撇在一边，不要把他们搞得灰溜溜的。有些事情不了解党委有问题而表示拥护校党委的，要保护。3、可以开学生代表会去发动群众。可以依靠党团员、左派去串连发动，组织队伍。4、主要是搞教职员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学生中的以后再搞……5、对错误的，要顶住，他们闹起来也不要怕，是个暴露。

这一精神，也即当时湖北省委掌握的中央精神原则。从后来披露问题看，在武汉各大学出

现争论、拉锯的6月下旬，工作组也基本上是按这个精神控制运动的。

6月28日，毛泽东从长沙抵达武汉，住进东湖宾馆梅岭一号。

同日，王任重任在武汉起草《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我们的建议》报告，强调了工作组的作用和在知识分子、群众中抓右派的重要性，试图作为指导运动的文件。

6月29日，湖北省委召开研究省“文化革命动态”的会议。会议记录许道琦书记发言如下：“今天开的是如何抓《文化革命动态》的会。现在全省组织三千人以上的工作组，到各校去了，武大的问题见报以后，在本地区开辟了战场，会有很大的震动……这场斗争是场很严重、很关键、复杂的阶级斗争，斗争的双方都在抓文化革命这个大旗。观察问题要很敏感，很尖锐。杂技团夏菊花的问题就很复杂、尖锐。这两封信是在夺夏菊花的权，也就是夺市杂技团的权。（余杰：四清工作队很混乱。）那个雷鸣是什么人？那个自称最年轻的工作队员江文琳又是什么人？是否是反革命？很难说。他实质上是反对王任重同志那篇文章的精神（按：指《一朵红花》）。第二条就是，这样大的文化革命需要我们去领导。群众起来后，必然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如有的要求废除考试制度），怎么使运动斗争的锋芒对准主要矛盾，将这些要求引导到主要方面去，这是个大事。对反革命、敌人的活动要注意。编动态要把活动的动态抓起来，省委要掌握这个东西，中南也要掌握这个东西。重点学校的情况要直接往上报。前些时反映了一些材料，但活的动态不多，一个单位究竟怎样活动的，看不出来。……现在群众中错觉很多，怀疑很多，好多根本不能联系的事都联系上了。厂矿都在市里，你们（指武汉市委）把工农的声音搞响一些”。

以上记录仅仅是一个片断，《动态》是当时省委掌握运动情势的内部参考资料。尽管高校几乎像干柴般轰然起火了，从讲话看，由于四清运动和北大大字报的广播，工矿与事业单位也在波及之中。6月中旬初，湖北省、市委工作组分赴大中学校和文化单位，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业已全部到位。省委根据当时中央指示，提出“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审查教职员队伍”。这个原则也是中南地区普遍贯彻的，6月11日，广州市委召开全市中学教师大会，就要求教师们行动起来，和学生们一道，横扫教育界的一切牛鬼蛇神。雍文涛书记在动员报告中说：“这次运动的矛头，就是指向大大小小的邓拓之流。”

次日，陶铸电中南局：中央决定要点名批判周扬，中南要组织人准备写一点有份量的文章。要调查一下他的家庭情况。把他在中南各地的讲话搜集整理出来。半个月后写出文章。

同时也指出学校中提“保卫校党委”的口号是错误的，只能提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校党委是正确的，只能提“拥护校党委”。（张）平化同志已调中宣部为常务副部长。（王）延春为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吴冷西已停职反省。要调一个机要秘书（按：到北京工作）。

不久，雍文涛奉调进京，中南局对北京文革运动领导班子的贡献，正在加强中。

在6月全月，武汉大中学校学生响应号召，积极参加文化革命运动，从实际情况和总趋势看，学生群众是真诚欢迎与拥护工作组的，寄希望于省委派来的工作队，帮助揭开学校的“阶级斗争盖子”；但在对干部的看法和运动的方法上，学生、教师群众内部开始产生分歧。一些学生激进的言行和缺乏政策观念，引起领导和骨干学生的反感，以至成为当局定“右派”“反革命”的理由。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越南留学生，实在看不下去，天真地去给院党委提意见：“既然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为何不能讲政策一些，为何总在院领导名字上打红叉叉”？

（未完待续）

□ 《东湖风云录》 徐海亮编著，银河出版社，2005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